

孙星群 著

言志·咏声·冶情

《乐记》研究与解读



人民
出版
社

言志
詠聲
治情

——樂記研究與解讀

孫星羣

责任编辑:侯俊智

装帧设计:语丝设计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言志·咏声·冶情——《乐记》研究与解读/孙星群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01-011376-0

I. ①言… II. ①孙… III. ①《乐记》—研究 IV. ①J6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3294 号

言志·咏声·冶情

YANZHI YONGSHENG YEQING

——《乐记》研究与解读

孙星群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5.5

字数:340 千字

ISBN 978-7-01-011376-0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序 言

我对《乐记》没有研究，只是在古汉语教学和辞书编纂中接触过一些，认识很肤浅。星群要我为他的书《言志·咏声·治情——〈乐记〉研究与解读》（以下简称《研究与解读》）写个序，实在有点力不从心。我只能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想。

众所周知，《乐记》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虽然前人和今人对它做过一些研究，但真正要读懂它也还并非易事。《研究与解读》可以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作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立志要研究《乐记》；到 80 年代后期已初见成效，发表了不少有关《乐记》的单篇论文。在此基础上，又经过多年的努力才完成了《研究与解读》这部著作。因此，《研究与解读》是作者几十年呕心沥血、潜心研究的结晶，它凝聚着作者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和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读《研究与解读》，最大的感受首先是资料的丰富和论说的透彻。应该说，《研究与解读》是在前人和今人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升华，它集中了原有的有价值的资料并补充、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这就为《研究与解读》提供了坚实的有力论据。如论述《乐记》的撰著者及成书年代时在引用各家的说法后又引用了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说服力很强。特别是把《乐记》的内容与楚简中的《性自命出》加以比照，条分缕析，步步深入，令人信服。其次是《研究与

解读》不囿于成说，而是有所发挥，有所创新。如关于《乐记》篇目的排序问题，作者列举了《史记·乐书》、《礼记·乐记》、刘向《别录》、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注疏》及今人吕驥的不同编排顺序，指出是由于编者的观点不同，理解不同，儒学修养的深浅不同，儒学师承的不同所致。作者认为可以从封建社会的礼制地位、齿序和谈话时间及学术地位方面来考虑，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很有见地的。第三是从文字训诂入手进行训释。《乐记》共十一篇，这是《研究与解读》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部分，包括“原文”“释文”和“解读”。“释文”是对“原文”的白话文串解，而“解读”则是对“释文”的进一步论述和评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字词的解釋中吸收了古代的大量的训诂资料，如《礼记·乐记》“礼主其减”，“解读”以《史记·乐书》的“礼主其谦”训之，这就加深了对原文的理解，使《研究与解读》上了更高一个层次。第四是“信、达、雅”的语言风格。《乐记》句式工整，讲究对偶排比，带有诗歌语言的特点。《研究与解读》在释文中也尽可能做到了这一点。正如作者所言，要尽量地锤炼文字，追求形式美，达到形声相益。读了“释文”，深感著者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不仅字词释义准确，句式整齐，互为呼应，而且行文生动优美，顺通流畅，显示著者的学术造诣。

《研究与解读》以社会政治、文化为背景，从音乐学、美学、文学、哲学、史学、礼学、社会学、训诂学、国学等方面多视角地深入阐述了《乐记》的诸多内容，它实则包容着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交融，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研究《乐记》的同类著作中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一部，值得向大家推荐。

郭成韬

2009年10月于北京

前 言

——我研究《乐记》的思考

1962年11月20日，我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斜对面万叶音乐书店买了一本吉联抗先生的《〈乐记〉译注》（音乐出版社1958年版）。由于时代悬隔，第一次接触《乐记》，翻开它多有不甚了然之处，当时我就希望能有一本结合夏、商、周、春秋、战国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哲学背景的，有古汉语训诂的《乐记》今译本与我相伴而读，这样才能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从那以后，我就时时地翻读它。

《乐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乐记》阐述的音乐与国家、与政治、与社会、与自然、与人际、与情性、与道德、与伦理的论述，是那样的深邃，那样的人情入理。它心游万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蕴涵着现实与浪漫的翩翩思维，让人在“类比推理”中感悟它思想的真谛；它的语言是那样的流畅优美，文字的平仄、音韵、对仗是那样的自然，带有诗歌语言的特点，一幅先秦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哲学、军事、民俗以及音乐学的灿烂图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孔子（前551.9.28—前479.4.11），春秋末期人，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儒家

学派创始人，乃“万世师表”。孔子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创立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在世时被誉为“天纵之圣”（《论语·子罕》）、“天之木铎”（《法言·学行》）、“千古圣人”，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孔子思想的伟大已为世界所公认，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

儒家思想今天已播及世界，又重新爆发它旺盛的生命力。自2004年韩国创办世界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到2007年9月2日为止，中国已在15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75所孔子学院，这都是各国的教育部长、教育官员或者是驻华大使在中国国家汉语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动申请的，到2010年世界建立的孔子学院增至500所^①。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认为：中华民族悠远、灿烂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美国多元文化的内涵，孔子完善的教学思想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议会于2005年通过决议，将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生日9月28日定为“孔子日”；2006年6月6日纽约州众议会又以全票通过把9月28日定为纽约州的教师日，以纪念这位对人类教育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先贤；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10月28日以压倒多数票通过议案纪念孔子，颂扬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做出的无价贡献”；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8年11月20日访问秘鲁时，为秘鲁的孔子学院揭幕。孔子思想波澜壮阔，浸润五大洲，为世界人民所理解、所接受。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5年11月29日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宣布从2006年开始在该组织设立“孔子教育奖”，以奖励在全民教育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有突出贡献的个人。这是联合国设立的首个以中国人命名的国际奖项。

为什么祭孔活动在21世纪再次勃兴？为什么祭孔活动显现国际化？我们清楚这是世界各国人民对孔子思想认识的深入与加强，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兴盛的迹象。孔子创建的儒学，孔子关于个人道德的修养，孔子关于教育的思想，儒家的“中庸”思想、“和”的思想，追求“和谐”世界的理想，对今天解决世界现代化狂

① 李洪财：《从改造汉字到复兴汉字》，加拿大《文化中国》2009年第3期。

飙进程中的诸多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世界的儒家学说》^①一书，集中了18位东西方学者的论文，他们都认为孔子思想遗产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们认为：当今社会的松散、不和谐与二千多年前孔子时代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尽管两个时代的外在表现千差万别，但都应该提倡孔子的“礼”，提倡孔子的“爱”。孔子“仁者爱人”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道家的“慈”爱、佛家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这种超越种族、超越民族、超越国家、超越阶级、超越地域、超越历史、超越意识形态，都是今天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所需要的博大思想。书中北欧亚洲研究协会高级研究员盖尔·赫尔格森援引2006年10月在韩国进行的一次调查，有87%的受访者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儒家的“天下大同”，这是对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国家——韩国调查的结果，而受儒家思想影响不深的北欧丹麦有75%的受访者也同意儒家的“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思想将给这个世界以极大的帮助。

孔子是一位音乐家，《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论语·述而》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他唱歌认真而执着；他会击磬、鼓瑟、鼓琴，《论语·宪问》载：“子击磬于卫”，《史记·孔子世家》还载：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的事。孔子即使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陷于困境仍然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庄子集解·让王》云：“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弦歌鼓琴，未尝绝音。”这真是达道圣人歌乐自娱不以为事也。《论语》中记载孔子谈乐的多达22条。因此，孔子对“乐”的研究、论说，都立足于他的生活阅历、政治仕途、音乐实践，也就十分地深刻，十分地有见地。作为儒家学说的经典《乐记》，对中国的浸润自然也就深也，广也。

今天研究《乐记》的意义

一、《乐记》是儒家的基本经典之一，它和《十三经》都是历代统治者制定国策

^① 《日本时报》9月10日文章，见《参考消息》2006年10月18日，第14版。

的根据，仅以乐和礼序论之，它的重要性正如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所说：“顺之则宗祏(shì)固，社稷宁，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则纪纲废，政教烦，阴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遵从《乐记》宗祏就固，社稷就宁，君臣就序，朝廷就正；逆之，纪纲就废，政教就烦，阴阳就错于上，人神就怨于下，它对社稷、对纪纲是何等的重要！

二、《乐记》是中国先秦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总结，是先秦《周易》思想、孔子儒家思想、殷周以来非神的天道思想、无神论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在许多方面都体现出巫术的深刻影响，它对艺术上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作的理论探索，所提出的许多前人未曾发表过的创见，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所以清人焦循《礼记补疏序》说：“《礼记》万世之书也”；郭沫若说“凡谈音乐的似乎都没有人能跳出《乐记》的范围”，不了解《乐记》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音乐思想，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的。

三、研究《乐记》，推动《乐记》在汉儒文化圈的传播，推动《乐记》在世界的传播，不仅是中国音乐哲学、美学思想研究的需要，是世界各国研究中华文化的需要，也是21世纪发展的需要。

四、《乐记》提出的“乐者敦和”“乐和民声”“乐和上下”“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思想，《乐记·宾牟贾》篇描述武王的仁政、武王的弛武、武王的“五教”、武王供养老者亲自为老人割猪羊牛三牲、向老人馈送酱、向老人举爵献酒的尊老爱民行动，就是《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评述的“武(王)有七德”：“武，禁暴、戢(jì)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乐记》在《宾牟贾》篇为人类勾画出的这幅和谐人民、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将给这个“失控的世界”提供极大的精神支持。

希望《乐记》能为更多的今人所接受，希望《乐记》在今天的人类文化艺术生活中，去芜存菁，弘扬光大。

《乐记》思想的长足与不足

一、我国哲学的许多概念是多相式的，它的长处是具有灵活性、多义性、兼容性，它能启迪人们全面地思考问题，给人以博大、深邃的感觉，但它从内涵到外延所造成的多解性、游移性、伸缩性，也就成为它的不足之处。《乐记》中所论述的“乐”、“礼”、“和”等许多重要问题其含义的灵活与多解、多义与游移、兼容与伸缩，都是同时存在的，灵活、多义、兼容，说明它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全面地认识它们，把握它们的全部基本要素。但概念的多解、游移、伸缩性，也就不宜于从微观上把握上述概念的具体要素，进而确认概念的界定，如在“礼乐”的相辅、相成、相映、相补、相节、相制的关系中就提出礼外乐内、礼顺乐怡、礼减乐盈、礼文乐质、礼文乐静、礼义乐仁、礼志乐和、礼异乐同、礼理乐情等等；如“和”，提出和民心、和上下、和天地、和万物、和天下，它蕴藉着“乐”的调和、协和、谐和、平和、和顺、和亲、和敬、和爱、和藹、和畅、和乐、和睦、和悦、和易、和婉、和衷、和善等含义，宽泛而多义。

二、推理缺乏规范和程序，只能类比，如《乐记》中所论述的问题类比的多，界定的少；问题直述的多，思维推理的少，因而全书逻辑的系统性和形式化不强。当然，这与《乐记》成书后，后人的补、编、修饰，甚至篡改都不无关系的。

三、顿悟多于思维的理性化，《乐记》少于概念的分析，以准确地把握音乐及其本质，全书的表达“意会”的多，这与我国儒、道、玄、佛诸家的历来主张不无相关。如儒家孟子主张“反身而诚”的“尽心”修养，达到“知天”、“知性”；道家老子的“道常无名”（第三十二章），庄子的“语之所贵者意也，……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天道》），提倡通过“心斋”、“坐忘”的修养，靠直觉来“无思无虑始知道”（《知北游》）；玄学的王弼说：“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亦即言不尽意，意在言外；佛学的禅宗提出要以“不立文字，直指本心”的顿悟法来看待世界。以上这些观点一方面给我国的理性思维涂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这是它的缺陷。但，不能不承认它能诱发我们丰富的联想，有着广阔的驰骋天地，容易从历史的角度、用辩证的

方法去看待和认识它们，之所以这样，一如上述辩证逻辑要求把握全部基本要素，全面地看待问题，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整体总是多属性的，因而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也不能不是多相的，这也就必然地影响到中国的音乐思想在概念和范畴上的多相式。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辩证逻辑在概念上所产生的多相式，它的灵活性、多义性、兼容性在某种程度上要比西方的单相式概念的准确性、单义性、单功能，有着更丰富、更深邃、更博大的内涵。以最赋有《乐记》思想的古琴为例，它无柱、无键，但它能通过擘、托、抹、挑、勾、剔、打、摘等各种指法及它的各种组合，有着非常强的歌唱性和表情性；它“散、按、滑、泛”的音质蕴涵着独特的文化品位；它的散板“偷”半拍，在重拍处用虚音，在弱拍处用实音，奏来使乐曲充满跌宕、写意之趣；它的“吟”有细吟、大吟、游吟、飞吟、长吟、落指吟等细腻表情之分，其表意手法是其他乐器绝无仅有的；它的高、雅、远、深、广、微、精、细的审美情趣，让人体味到它的美学具有儒家、老子、庄子“音乐—艺术—文化—琴道”的多层次，所以，中国古琴的表现力不在于西方的钢琴之下。再以中国的竹笛为例，它无键，似乎音不容易准，但它在追求音准的前提下，还可以通过左手的“叉口”手法，即按半孔及用指法变化的方法使音升高或降低；用“控”的手法，即通过气息的控制，使音量发生变化；用“气变音”，即通过气流速度及方向的变化，使音升高或降低，幅度可达半音。在这一点上比有键的西方长笛的表现力，不能说不丰富、不多样。这是否与“模糊数学”概念类同？

四、《乐记》产生于先秦，它的内容深深地渗透着儒家“君为臣纲”、为巩固皇权服务的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沿续到封建社会的终结；今天我们在弘扬《乐记》音乐思想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剔除和批判这种思想的必要性。我们要用唯物史观去看待它，同时也尽量保留当时的观点、思维、遣辞用字，如“阴阳”“鬼神”“君子—知乐”“小人—知音”“禽兽—知声”等等不符今天唯物史观的文字于文中，“声”“音”“乐”也保留原文之本意，不用今天的内涵去代替它。所以对《乐记》的长足与不足不能一以概之，不能简单的贬斥，更不能盲目的否定，我们今天研究它就是要在发扬其长处的前提下弥补它的不足。

五、孔子儒家重视礼，他在《论语》中讲“礼”多达 75 次（包括“礼乐”并提在

内)^①，儒家主张礼乐相成，要让辨异贵贱等级的礼与缓和矛盾求齐求同的“乐”相和、相成，使我国的传统音乐二千多年来一直强调“乐”的内容，强调“乐”与仁与义的结合，作为政、刑的辅助手段，在治心、治家、治国、治天下中起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也就是说二千多年来，功利性在我国传统音乐中居于统御地位。儒家礼乐观的“功”在于：(1) 齐民、劲兵、强国；(2) 和亲、立志、得道；(3) 辅礼、辅政、辅刑罚；(4) 治心、治家、治天下；(5) 让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得到正当的怡悦之情。儒家礼乐观的“过”在于：(1) 过分强调功利性，过分强调化人、和民、中和、和人、淳古淡泊、平心、宣化的修德养性，这就使动于情的“乐”丧失了它的初衷本性，丧失了它的纯真性、纯洁性、纯朴性；(2) 儒家所提的“乐者乐也”，“乐”的娱乐性、怡情性都必须在“礼”的节制下，在“乐”与仁、与义、与政的功利性的节制下“乐(le)也”，因此，也就给“乐者乐也”戴上了“礼”的桎梏，仁、义、政的桎梏，只让我国的传统音乐在温文尔雅、敦厚柔美这个范畴内发展，丧失了“乐”在宣泄感情方面的许多珍贵属性。当然二者相辅相得、相节相制，不可偏废。

本著的三点新意

一、本著借考古学之力，以 1993 年冬出土、1998 年 5 月出版公布于世的湖北楚墓竹简为据来论证《乐记》的成书年代，引战国中期郭店楚墓《性自命出》篇 43 条竹简内文与《礼记·乐记》的 60 段内容进行比照，提出《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及其之前。本书著者曾借赴韩国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于 2002 年 12 月在韩国国乐学会 (KOREAN MUSICOLOGICAL SOCIETY) 主编出版的《韩国音乐研究》(STUDIES IN KOREAN MUSIC) 第 32 辑第 293—301 页发表了拙论《郭店楚墓竹简中的音乐思想》，对成书问题作了论述，当时以 33 条竹简内文为据，论文最后说“概而言之，《性自命出》与《乐记》都是儒家著述，其音乐思想一致；《性自命出》篇为我们提供了《乐记》作于战国的有力论据”。后来对拙文作了补充润饰，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试论孔子》。

2005年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天籁》第3期第3—10页发表拙论《〈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这是目前所见到的《乐记》研究著述中，最早的一部借《性自命出》与《乐记》作比照研究的成果。

二、从训诂学的角度诠释《乐记》，比照《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

1. 由于文字在流传的历程中其语义会有诸多的变化，今天的我们对《乐记》都有许多不甚了然之处，如《礼记·乐记·乐化》篇提“礼主其减”，《史记·乐书》把三个“减”字都作“谦”字，提“礼主其谦”。《乐记》的“礼减乐盈”是以礼减对乐盈。“减”字的基本义《说文·水部》说：“减，损也，从水，咸声”，礼减要求外在礼的形式要简单、简便、简洁、简略、简明、简朴、简要、简易，不可繁杂、繁琐，至为精切。《乐书》作“礼主其谦”，“谦”字的基本义《说文·言部》说：“谦，敬也。从言，兼声”，司马迁在《乐书》中说：“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他提出：“君子以谦退为礼，以减损为乐。”礼谦要求动于外，动于形的礼，要谦逊，敬也，恭也，自谦慎也，要竭情尽慎，所以司马迁把“礼主其减”改为“礼主其谦”。《礼记》的“减”更多地从数量上、程式上要求，故主其减，也许它更符合春秋战国群雄并起、战乱频仍时期礼减的要求；《史记》的“谦”蕴涵着心灵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哲学的修养，更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的高尚品德，也许它更符合秦汉帝国统一强大之后的盛礼需要。《乐记》与《乐书》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说的，它们的引申义亦不尽相同。宋代陈旸在他的《乐书·乐记》的诠释中认为：“史迁谓君子以谦退为礼，而不知其文主进；以减损为乐，而不知其情主盈。未为深于礼乐者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2. 《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是何关系？《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乐书》取《礼乐记》”，说明《礼乐记》在先，《史记·乐书》在后。这就明确了《乐书》来自《乐记》。

3. 《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的不同处：(1) 司马迁《乐书》开头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有763字，而《礼记·乐记》没有；(2) 《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有161处文字不同，除之、乎、者、也、矣、焉、哉、兮等语气词、感叹词以及有某字

或无某字，本著不作解析外，其他不同字词都作了比照与评说。

4. 陈旸《乐书·乐记》的诠释中有9处批评司马迁《史记·乐书》的说法不对，同意《礼记·乐记》的观点。仅举三例：

(1)《乐施》篇第23条：《礼记·乐记》用“其舞行缀”，司马迁《史记·乐书》用“其舞行级”，陈旸批评说“司马迁以舞之行缀为行级，失之矣”，“行缀”是舞队行列；(2)《乐象》篇第38条《礼记·乐记》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司马迁《史记·乐书》把这条从《乐象》篇调到《乐施》篇，把“车”改“舆”，用“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舆也”。车是古代陆地的交通工具，舆是架在车上的车箱。所以陈旸批评说“史迁《乐书》易车为舆是不知车可以统舆，舆不可以兼车之意也”；(3)《宾牟贾》篇第52条《礼记·乐记》对黄帝、帝尧、帝舜、夏后氏之后代都“封”于各地，对殷之后代用“投”于宋地。司马迁《史记·乐书》对黄帝、帝尧、帝舜、夏后氏之后代用“封”，对殷之后代改《礼记·乐记》的“投”为“封”，即“封殷之後于宋”。“封”《说文·土部》云：“封，爵诸侯之土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书·蔡仲之命》曰：“肆予命尔侯于东土，往即乃封，敬哉！”这是对黄帝、尧、舜、夏的尊重、敬仰，是要他们的后代臣服于周共同治理国家；投《说文·手部》曰：“擿(zhi)也”，有掷、扔、击、弃、置等义，对殷之后人投于宋地，是以警戒殷之后人与世人。陈旸批评司马迁“言之第弗深考尔”，是考虑不深尔。太史公在“自序”中评论此事说：“武王牧野，实抚天下。”这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有史以来，凡取得国家政权的，一定要将前朝的后裔杀尽，坟墓掘毁填平，典章制度更改，文物大肆毁灭，以体现天下乃“孤”之独创，而武王仁爱实行仁政慈爱天下，敬哉黄帝尧舜夏。

三、本著以小戴圣的《礼记》为据。参阅东汉郑玄注《礼记》、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疏、宋陈澧《礼记集说》中对《乐记》作的“注”“疏”，这四部著述篇目的编排顺序都一样。还参阅南朝宋裴驷《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中对司马迁《史记·乐书》的注释。对郑玄、孔颖达、陈澧、宋裴驷、司马贞、张守节的“注”“疏”“注译”，本书都在页注中加以说明。还把宋代陈旸《乐书》中的《乐记》作为附录收入，清代李光地《榕村全集》中关于《乐记》的几段论述也作为附录收进拙著中来，因为陈旸、李光地都是我国、更是福建历史上重要的、著名的

学者，他们的著述“长啸气若兰”，对我国、对福建、对后世文化的发展“应之如景响”，不能不收，并对陈旸《乐书》作了标点、校对了引文、查考了引文出处。通过本书著者对陈旸《乐书》的初略统计，陈旸294次引用33本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周易》《乐记》《国语》《尚书》《毛诗序》《诗经》《左传》《老子注》《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庄子集解》《荀子集解》《列子注》《扬子法言》《中庸》《孝经》《吕氏春秋》《史记》《白虎通》《文献通考》《春秋传》《世本》《尔雅》《公羊传》《逸礼》《后汉书》《大戴礼》《初学记》《世家》《逸诗》等等，引用最多的是《周易》《周礼》《诗经》《乐记》《尚书》《国语》《荀子集解》《论语正义》，分别都引了20至40次。这就使拙著有了八闽特色，呈现出福建博大精深的儒学传统，呈现出福建学者研究《乐记》的悠远历程，同时又为读者送上平时不易找到的两部闽人研究《乐记》的著述，以便于阅读与研究。

《礼记正义·乐记》十一篇，正文无篇名，共5128字。

本著分为三个章：

第一章简述“六经”与《乐记》的关系，简说何谓“经”，“六经”的提出，何谓“六经”，“六经”的功用，为何“六经”缺“乐”，何谓“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其意在于介绍《乐记》与“六经”的关系及其初步知识。

第二章论述《乐记》背景，《乐记》篇目与版本，《乐记》注疏本，《乐记》价值，《乐记》撰著者，《乐记》成书年代，《乐记》与楚简《性自命出》的比照，《乐记》诸问题的论辨等。其意在于探究《乐记》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希望著者对《乐记》成书年代的一己之见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章占全书正文篇幅的三分之二。著者在每篇开头有几个字的中心思想；在每篇的结尾有简短的“概而述之”，给读者提供理解每篇的方便。全书十一篇按郑玄注《礼记正义》分段，序号为本书著者所加。每段分为“原文”“释文”“解读”三个部分。

1. “原文”及其标点句逗、分段均以（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的《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乐记》为蓝本。原文排法力求一目了然，看出原文排比、对仗等修辞手法。

2. “释文”拟从训诂学的角度对《乐记》作逐字、逐句的诠释，以了解字、词的基本义、概括义，并根据基本义、概括义随文而释它的具体义、引申义、假借义，让读者明了“释文”与“解读”之所据，之所出。

3. “解读”部分对《乐记》作了哲学上、音乐学上的分析，如“大乐必易”“礼乐相成”“唯乐不可以为伪”“乐不耐无形”等，及音乐史、音乐传说、乐器等的分析，提出音乐美学的哲学基础是“‘一’与‘不一’”的对立统一，论说了“乐”之静与动、统一与矛盾、“一”与“不一”的辩证观，这几段引用了拙著《音乐美学之始祖“乐记”与“诗学”》相关篇章的观点与文字。对《武》乐的结构六成作了详尽的引证、分析。对前后篇、上下段作相应的综合的解读分析，并引用《礼记正义》中郑玄对《乐记》的“注”、孔颖达对《乐记》的“疏”，这样我们就能从训诂学角度理解、认识《乐记》，从哲学的角度理解、认识《乐记》，从音乐学的角度理解、认识《乐记》。

本书在撰写中还注意了以下问题：

根据《乐记》有的句式整齐，字数相等；有的偶对平衡，整齐划一；有的句句入韵，或隔句入韵的特点，“释文”中也尽量注意句式的整齐对称，进而讲求句式的形式美；

根据《乐记》文字流畅优美的特点，“释文”的遣辞造句也尽量讲求文采，以求文饰之美；

根据《乐记》古汉语抑扬有节、节奏有序、铿锵上口的特点，“释文”中也尽量锤炼文字，形声相益；

生僻字、多音字脚注时加注音；异体字用通行字，古今字用今字，通假字用正字，简繁字用简字。

目 录

序 言	郭成韬	1
前 言——我研究《乐记》的思考		1

第一章 《乐记》与六经

一、何谓“经”	1
二、“六经”	2
三、何谓“六经”	3
四、“六经”的功用	4
五、为何“六经”缺“乐”	5
六、何谓“三礼”	6

第二章 《乐记》研究

一、《乐记》历史文化背景	10
二、《乐记》版本与篇目	15
三、《礼记·乐记》《史记·乐书》注疏本	18
四、《乐记》影响	19